



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 (1931—1938)

*Early Anti-Japanese Fascist
Literature Journals in China(1931-1938)*

韩晗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 (1931—1938)

*Early Anti-Japanese Fascist
Literature Journals in China(1931-1938)*

韩晗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 / 韩晗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08-6928-0

I. ①早… II. ①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期刊—研究—1931—1938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8040号

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

作 者	韩 晗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4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928-0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8年6月

推荐短序

韩晗的《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一书，研究抗战文学期刊文本内外复杂的脉络。作者钻研不同阵营、领域的史料，梳理战时文艺的意识形态以及情感结构，辩证理念话题，并思考战争与文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全书史识丰赡，论述详实，诚为探讨抗战时期政治与文化互动的重要著作，有心读者不容错过。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 王德威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樊星：一部以史为本的学术著述

——序《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

韩晗是我指导的博士生，这次他的博士论文重新增补修订成书，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韩晗邀我作序，作为这篇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非常乐意。

2010年，由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任心廉同志（现已故）与著名作家陈应松先生联名推荐韩晗考我的博士，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一位年轻的“八零后”作家。但入学之后，韩晗展现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潜力。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坚持文学创作之外，他还发表了近六十篇学术论文，总被引近百次，并相继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2013年，韩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同志共同推荐他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站两年多里，他再接再厉，在科学思想史、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获得赴美留学深造的机会，2016年破格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职称，同年又被时任深圳大学副校长的李凤亮教授邀请南下至该校文化产业研究院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这对于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他有志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

韩晗的这篇博士论文，就是他潜心学术研究的一个证明。早期抗日文学期刊，是国内学术界一个较少涉及的课题，当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史料难寻。尤其是散佚的书信、日记、期刊、电报等一手史料，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火摧残与七十余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还能幸存多少？这恐怕是束缚该领域深入研究的一个桎梏。

在写这篇博士论文之前，韩晗就有心收集了许多学术期刊，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如《狮吼·复活号》一刊，在当下学界可谓是一册难寻，邵绶红女士为其父邵洵美先生编文集，就曾找韩晗复印过该刊；在《现代文学评论》《絮茜》等珍稀刊物中，韩晗钩沉史料、挖掘真相，协力翻译家、抗战战地记者杨昌溪先生的哲嗣杨筱埒女士编辑出版了《杨昌溪文存》，并在《外国文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杨昌溪研究的专门论文多篇，成为了目前学界对杨昌溪最早、最全面的研究。在对史料的占有上，韩晗先人一筹，因此，他对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的格局、状况与历史得失，显然有一定的把握与研究，也为《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一书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该著中，韩晗选取了“第三党”创办的《絮茜》杂志、“左联”背景的《夜莺》杂志、国民政府官方背景的《越风》杂志与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呐喊（烽火）》杂志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精神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在重提抗战精神的当下，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

而且，该著敏锐地建立起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被前人的观点所束缚，以史为本，敢于突破并寻求创新，体现出青年学人尊重历史的良好学品与学风。譬如该著通过对《夜莺》杂志的系统研究，并对“两个口号”之争中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话语权力”进行完整梳理，颠覆学界既成观点，因此有着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而对于《絮茜》杂志的研究，则从“第三党”抗日办刊的文学活动入手，结合具体的史料，提出了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先生主编）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就《呐喊（烽火）》出刊情况的总结与研究，修正了胡风在回忆文章中对该刊有成见的评价。上述这些都证明了该著是一本以史为本、敢说真话、见解独到的学术力作。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用“全书史识丰赡，论述详实，诚为探讨抗战时期政治与文化互动的重要著作”来称许该著，且又能在诸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立项，可见该著的学术意义有目共睹。称道的话我不再赘述，最后我想说的是，“年方而立”的韩晗还很年轻，前方的学术道路仍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他以这本书为一个新的起点，勇于开拓、敢于否定、乐于思考，在做学问的道路上矢志不移、继续前行。

曾记得五年前韩晗离开武汉时，我曾借唐人王湾的名句“风正一帆悬”题赠给他，希冀他以端正之学风、朴正之文风与守中持正君子之风在治学、创作与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在这篇序的最后，我仍用这五个字作为对他的期许，因为，他依然很年轻。

是为序。

戊戌立春 于武汉大学

樊星，男，1957 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引 论	1
一、研究意义	1
二、核心概念	7
三、文献综述	11
第一章 概述	12
第一节 抗战前期中国社会思潮述略	12
第二节 期刊发展格局与抗战前期中国社会思潮	28
第二章 “第三党”文学期刊的文化品行	40
第一节 “三个”张资平	43
第二节 作为话语实践的“呐喊诗”	51
第三节 “平民文艺”理想的破灭	58
第四节 作为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的《絮茜》 月刊之经验与教训	74
第三章 “左翼”文学期刊的文化选择	83
第一节 “被无视”的《夜莺》	84
第二节 《夜莺》所刊载文章之文学与理论价值	90
第三节 《夜莺》月刊与“两个口号”之争	105
第四节 《夜莺》月刊之历史价值	118
第四章 官办文学期刊的文化策略	123
第一节 “以浙为主”与“昌明国粹”	124
第二节 借古讽今：返祖民族主义、国难与救亡	132
第三节 《越风》月刊之文学史、社会史与学术史地位	143

第五章 人道主义文学期刊的文化立场	151
第一节 一份真实的《呐喊(烽火)》周刊	152
第二节 “《呐喊(烽火)》作者群”	156
第三节 《呐喊(烽火)》周刊所刊发文章之特色	162
第四节 《呐喊(烽火)》周刊之历史地位问题	171
第六章 结语:超阶级、民族救亡与人道主义	177
第一节 对“阶级性”的超越	179
第二节 实质性的变化:从“民族救亡”到“人道主义”	185
第三节 媒介议程/公共议程: 战争语境中话语权力之书写范式	190
尾声:1938年以后	200
参考资料	203
后 记	212

引 论

一、研究意义

“十四年抗战”是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放眼历史，顺应时代潮流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论断，目前受到学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认可。具体来说，抗战是一场全民族的救亡运动，除了作为中流砥柱与“抗战先行者”的中国共产党之外，“第三党”、国民党主战派与无党派知识分子们的抗战同样可歌可泣。在“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之间，以“古北口七勇士”、李学忠、邓演达、陈三立为代表的抗日先驱，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不屈之歌。因此，对“十四年抗战”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史状况的总体梳理，理应提上研究界的日程。

但毋庸讳言，受制于现有史料的不足与长期以来学术热点的变化，且莫说对“十四年抗战”文学史的研究与重写，仅就传统意义上的“抗战文学”研究而言，现在仍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除了像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这样重大的历史活动外，全国性的抗战文学研讨活动日渐减少，曾经影响一时的专门性学术杂志如《抗战文学研究》早已停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中的“抗战文学方向”因为招生困难而叫停，大学本科选修课《抗战文学研究》无人问津。^①而且，某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甚至还认为“抗战文学在今天可能不仅难以引起兴趣，甚至还招致反感”。^②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界应当借助“十四年抗战”这一新思路、新视野，重启抗战

① 吴伟强、李怡：《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

②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文学研究之门。

“抗战文学”之所以热度不够并形成研究困境，很大程度是对于“抗战文学”这一词的理解，甚至对于抗战文学时间起讫点这一基本问题都有争议，譬如有学者认为，“抗战文学”纵然在广义上也不过是“即1937年至1945年间的文学创作”，狭义上则是“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①，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时间上看，抗战文学理应从“九·一八”事变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性事件”算起，^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关于“抗战文学”时间起点，学界几乎长期各执一词，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束缚了抗战文学的深入研究。

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对抗战文学的时间有一个基本的界定，这是研究抗战文学的前提，“十四年抗战”的提出为这一问题赋予了定论。因此，在此基础之上，势必要关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们如何以笔为枪、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寻找共识的历史进程，从中探索出“十四年抗战”中国文学与社会思潮相辅相成的变迁规律，这是抗战文学研究界在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

但是，不同社会力量在早期抗战期间特别是“文化抗战”中的合作与贡献，其研究仍显不足。因此，如何超越对抗战文学史的片面理解，从“十四年抗战”的高度出发，审理作为一个文学场域的抗战文学中所蕴含不同的力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将抗战文学上升为对一个属于全民族乃至人道主义文学体系的理解，这是摆在现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共同问题。

当然，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观照对象的抗战文学的研究，本身是对一段过去历史的追溯，因此我们离不开对于一手史料的钩沉。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即其在研究范式上必须是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研究等多重研究范式的结合，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研究。但这不但诉求于研究方法的多重性，更受到史料的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相对成熟，但又存在着较大重构空间的文学史研究领域，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研究，作为研究材料的史料显然不

① 曹万生、李琴：《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逢增玉：《“九·一八”国难与东北抗战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可或缺。周传儒^①曾这样论述史料之于一门学科的意义：

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②

因此，对抗战文学的重新审理，无法无视一手史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当下研究界对于抗战文学关注不足的原因之一便是一手史料的缺乏。经历了战争的史料，本身很难寻到。尤其是一些期刊、书信与档案等原始的资料，大多零散不齐，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较大的困扰。

前文之所以论述抗战文学的研究状况、研究意义及重新审理的价值，是为了介绍本著之意义。本著的题目为“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乃是“抗战文学”这个宏大学术命题之下的一个小的分支研究。之所以选择“抗战前期”乃是这段时间之于整个抗战时期有着重要意义，^③它既是从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的转变时期，也是国共两党从分歧到合作的变革时期，更是中国社会各界从“众声喧哗”逐渐走向“统一战线”这个统一趋势的历史

① 周传儒（1900—1988）四川江安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1928年毕业，入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曾赴英、德留学，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东北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书院制度考》《中国历史学界的新派别、新趋势》等著述。

②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开明书店，1934年，第1页。

③ 学界根据日军侵略中国的不同区域，通常将“十四年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局部抗战时期”，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忠杰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在这段时间里，日军相继吞并了东北、华北，并爆发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山海关战役与古北口战役等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战争，以及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第二个时期是“全面抗战时期”，即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18集团军），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国共军队及各地地方武装统一编制，开赴抗日前线，开始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期间，在山西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与滇缅中国远征军等正面战场的大型战役中，中国军队以牺牲数十位陆军将级军官与数百万战士的惨重代价重创了日军主力部队，作为同盟国军队的中国军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早期抗日文学期刊”中的“早期”即“抗战前期”，在本著中则是指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过渡期。

时间段,^①在“十四年抗战”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作为一手史料的文学期刊又是当时文学的载体、文学状况的最真实反映,因此,这段时间内的抗日文学期刊是可以小中见大地管窥当时中国文艺思潮及其本质的。从这段时间内的文学期刊尤其是抗日文学期刊出发,亦可以对“抗战文学”这个大的文学体系有所把握。

本著所选取的早期抗日文学期刊一共四种,按时序排列分别是:“第三党”背景、社会民主主义文学期刊《絮茜》(张资平主编,上海办刊)、中国共产党背景的左翼文学期刊《夜莺》(方之中主编,上海办刊)、官方背景、民族主义文学期刊《越风》(黄萍荪主编,杭州办刊)与无党派知识分子背景、人道主义文学期刊《呐喊(烽火)》^②(巴金、茅盾主编,上海、广州两地办刊)。上述四种刊物分别在杭州、上海与广州三个不同的重要城市办刊,影响波及全国各地,先后代表了当时最主要的四种思潮与四种不同的社会话语力量。^③而且,这四份刊物创刊的时间前后相隔仅六年(最早为1931年底创刊的《絮茜》,最晚为1937年8月创刊的《呐喊(烽火)》,几乎涵盖了整个抗战前期)。

综上所述,本著的意义有如下五点:

第一,对于一手史料尤其是细微史实、珍稀史料的挖掘,有助于还原一段重要文学史的现场。

目前的研究界对于抗战前期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以抗日文学期刊作为一手史料为研究资料的探索,几乎为空白(这将在“文献综述”部分予以详述),因此,本著的内容有着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作为一手史料的早期抗日文学期刊,最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格局、社会思潮、话语权力的分配、知识生产以及写作者的创作范式及其意识形态,因此,意图对这段时期不同社会话语权力拥有者所构成的

-
- ①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过渡期,国内各界空前团结,原本有分歧、矛盾的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团结起抗敌。如工人、工商业者、留学生、学生、文化人与退伍军人纷纷组织团体,请愿抗日,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见吴雁南、冯祖贻:《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0—552页。
 - ② 为行文方便,若是两刊合论,下文概统称为《呐喊(烽火)》周刊,若是单论其中之一,则只称为《呐喊》或《烽火》。
 - ③ 在由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节点上,具备话语权力的全国抗日力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国民党爱国人士与地方实力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抗日力量与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为代表的无党派知识分子。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三卷》,第520—550页。

“文学场域”进行还原性研究，则必须要通过对这些重要刊物进行审理。

而且，本著并非单纯只研究四种早期抗日文学期刊，而是结合其他珍稀期刊、罕见报纸、新发现的电报、档案与回忆录等辅助研究对象一道，进行互证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原始资料为海外回流，在研究界为第一次披露。

任何宏大的历史都是由细微的史实所组成的。因此，本著尤其注重对细微史实的澄清、重评与钩沉。譬如《絮茜》月刊与国民政府当局的关系、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呐喊（烽火）》周刊是否是一个“缩小的刊物”等史实，在本著中均一一做了相应的阐释。

第二，本成果打破“抗战八年”的抗战文学史研究，认识到“十四年抗战”的整体性，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抗日文学活动纳入到本论的重要研究范畴。

习近平同志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曾就抗日战争研究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济南惨案等均发生于“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华民族的抗战活动，自然也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相继发生。对于这段时间的抗日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学界已经开始重视，但对于早期抗日文艺活动，却较少涉及，部分甚至是空白。本成果即集中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与论述。

第三，在两岸关系重新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时刻，回顾文化阵线上全民族抗敌的意义，有着打击“台独”、促进统一的积极作用。

本著所研究的四种刊物，其实均拥有相互交叉的撰稿者。在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上，“抗战”逐渐成为了全民族念兹在兹的社会生活主旋律。四份刊物虽然分属于曾经有过纷争、矛盾的四个不同的力量阵营，但是在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他们都选择了抵抗的文化姿态——尽管有些走向失败，有些日趋壮大，但这些大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捐弃政见、党派之争，同仇敌忾的民族气魄。

在两岸关系重新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时刻，再度审理那段文学史，显然可以激发民族热情、唤醒民族共识、打击“台独”势力，有着促进统

一、团结民心与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作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从史料出发的真实历史叙事，其感染力显然远远要大于各类杜撰的“抗战神剧”，因此对于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的研究，除了文化、学术价值之外，还有着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四，有助于对中共党史中若干被忽视的问题进行重新发现，使得“现代文学史”对“中共党史”产生互证性的时代意义。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并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的建设，以及通过对一些文学社团、文学运动的领导，繁荣了中国新文学事业。因此，“现代文学史”在某个侧面上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学、艺术宣传的历史。本著从第一手史料出发，还原一段文学史，自然也不免涉及对于党史中关于文学宣传事业的史料钩沉。特别是对于《呐喊（烽火）》《夜莺》等刊物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发现党史中若干被忽视的问题。

以新方法、新史料进行党史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人文社科界的一个重要议题。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党史会议，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十号文件”下发，在党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两个“第一次”对于党史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①习近平同志对党史研究的问题曾做专门指示，“要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也指出，“新形势下，要继续抢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②“成就写够，错误写透”构成了当下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精神，因此，本著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一定的时代价值。

第五，对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有着深度反思的价值。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全面抗战前后抗日文学期刊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回答“知识分子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个重要话题。一批杰出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筚路蓝缕、千辛万苦完成着文化的赓续，既以笔为枪，痛斥汉奸卖国贼，唤醒国人抗敌的斗志；又苦心笔耕，完成了一篇篇至今仍有影响的理论著述与经典文学作品。这种可歌可泣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是值得在当下被重提、被弘扬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承担社会责任意识这一优良传统，纵使在炮火连天、

^① 李忠杰：《90年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瞭望》，2011年第5期。

^② 同上。

颠沛流离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不惧牺牲。这种献身时代、敢当道义的精神对当下的知识界无疑有着一定的启示与反思的价值。

二、核心概念

通过对上文的分析可以获悉，对于“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在此要对一系列构成本著中核心关键词的概念进行定义。这里的定义，并不是生造、扭曲一些概念原有的含义，而是在这些概念原有内涵基础上限制其外延。借此，针对本研究的核心，笔者特提出七个概念并试图对其进行定义：抗战前期、左翼、人道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抗日文学期刊。

抗战前期

“抗战前期”的所指“十四年抗战”中的前七年，即本著标题“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中的“早期”。历史地看，“抗战”是一个历时十四年的时间段，这里所说的“抗战前期”实际上是指“全面抗战”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据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并无任何一部工具书对“抗战前期”这个词的具体起止时间有过定义。就“抗战前期”这一时间段而言，结合所研究对象的创刊时间与社会影响，笔者认为，“抗战前期”应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即历史学界公认的“抗战相持阶段”的起点为止。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抗战前期”这一名词，在学界有多重定义，有学者认为，抗战前期应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但随着“十四年抗战”这一观点的提出，以及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的主战场等史学观点被认可，这一时间段也随之获得了新的定义。

在目前笔者力所能及所检索在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三地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含硕博论文）中，近十年内以“抗战前期”为主题的共有93篇，其中有45篇将“抗战前期”这一概念延伸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其中以河北大学何建立的硕士论文《〈光明〉杂志研究》、苏州大学阎志海的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研究》等等为